

二、北京大學岳昕事件觀察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王占璽主稿

- 全球#Me Too 運動帶動中國大陸社會重視性別權利意識，北京大學學生岳昕等人要求揭露 90 年代性侵案，遭校方推諉、打壓，引起社會關注，學生、校友聲援。
- 北大校內再次出現大字報，批評北大校方濫用行政權威施壓、脅迫學生，以及喪失追求自由精神與社會責任的北大文化傳統，另則反映校園對於中共管控、審查等種種作為的不滿。
- 中國大陸網民使用「區塊鏈」技術傳遞岳昕公開信，突破官方網管及訊息封鎖；中共積極利用科技建構「數位威權主義」的同時，民間社會亦未放棄破解官方箝制之道。

（一）前言

自 2012 年習近平上臺之後，中共持續加強對社會輿論的控制，「十九大」以來，各種社會監控的手段更推陳出新。在國家強勢的壓制作為下，中國大陸民間社會的自主性似乎陷入困境。然而，近期北京大學生岳昕事件的發展，卻展現出社會在威權治理下仍然具有強韌的自主意志與生命力。

2018 年，隨著譴責性騷擾行為的網路草根運動「#Me Too」在全球擴散，中國大陸社會的性侵問題也開始受到矚目。2018 年 4 月初，多位北京大學校友以網路實名舉報方式指控曾任北大教授、現於南京大學任教的沈陽，在 1998 年性侵北大中文系女生高岩並導致其自殺死亡。此事引發輿論熱議，而北大校方對於此事選擇模糊處理的態度，也引發包括岳昕在內的八位北大學生要求北大校方公開當年校內調查沈陽案的相關資訊。隨後岳昕在自媒體發表的一封公開信中，指出北大校方為避免擴大此事的爭議，以頻繁約談的方式對他及其家人施壓，公開信中也要求北大校方停止施壓行為。而在隨後數日內，北大校方與中國政府雖然以各種方式控制相關輿情，但卻無法阻止一連串由此引發的社會行動。而在岳昕事件發展的過程中，不僅反映出性別權利意識在中國社會的成長，也投射出當前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互動

關係的潛在契機。

（二）「兩個北大」的鬥爭

岳昕發表公開信不久，北大著名的「三角地」布告欄便出現聲援岳昕的抗議大字報，內文直指此事「是『兩個北大』之間的鬥爭」。

「兩個北大」的一方，是指在政績與形象考量下，對岳昕等學生以各種方式威脅、施壓，並屢屢迴避社會關注的北大行政當局。為了阻止岳昕公布沈陽案的相關資訊，北大校方不但以「能否順利畢業」作為要脅，更以涉及境外勢力的叛國罪恐嚇岳昕。而在大字報貼出後，此事更被定位為具有學潮性質的政治運動，並引發官方的重視。

而「兩個北大」的另外一方，則是指追求自由精神與社會責任的北大文化傳統。岳昕事件發生後，上百名北大校友發出連署公開信聲援岳昕，並批評北大校方的施壓行為損害北大的形象。北大在校師生也以發表文章及發起連署的方式，倡議應保障學生合法權利，避免約談制度遭到濫用。而由於北大 120 週年校慶將屆，也有北大學生使用 #NotMyAnniversary（不是我的校慶）的網路標籤，表達對北大校方的抵制及反對。

事實上，岳昕事件並不只是北大學生及校友對北大校方濫用行政權威的批判。此事在中國大陸社會引發的廣泛關注，其實反映的是一般民眾對於近年來中共以強勢手段管制社會輿論、干預學術自由、扭曲法律規範的不滿，以及對社會公義與法治價值的期待。另一方面，官方也毫無意外的對相關輿論進行全面管制。即使是由官方媒體人民日報及中國青年報發表的評論文章，也被官方刪除。然而，如同近年來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北京市整頓低端人口事件引發的強烈社會批評，在岳昕事件中，官方的輿論管制同樣無法有效的抑制民眾對開放資訊的期待，以及對權力濫用的反感情緒。

（三）網路空間中國家與社會的競爭：區塊鏈

「區塊鏈」是岳昕事件中另一個受人矚目的焦點。岳昕的公開信發表後，迅速引發中國大陸網民的關注與聲援，而在中共的網路輿論控制機制下，相關訊息毫無意外的迅速遭到網路平臺的屏蔽。然而，

網民藉由「區塊鏈」技術將岳昕的公開信附加在虛擬貨幣的交易網上，而使相關資訊得以全部得到備份保存。由於區塊鏈技術具有難以竄改或刪除的特性，使中共無法透過傳統控制技術進行屏蔽或刪除，任何人均可輕易的重複讀取資訊內容。換言之，這種技術創造突破官方網路言論審查及管制的可能性，為中國大陸民間社會的自主發展提供新的機會。

（四）結語

近年來，中共積極將各種高新科技導入對人民的監控行動中，除了無孔不入的網路言論監控機制外，基於監視器及人臉辨識系統打造的「天網工程」、仍在持續擴張中的全民 DNA 資料庫、以及結合大數據分析並試圖控制人民常規生活資源的「社會信用體系」，都使人難以忽視新型態的「數位威權主義」正在中國大陸成形，並對社會力量的生存空間帶來前所未有的威脅。然而，岳昕事件說明科技本身並不能單獨被國家壟斷，科技發展在為威權政府提供新的監控方式的同時，也仍能為社會力量帶來新的機會。

整體而言，岳昕事件的發展，呈現出即使在中共積極強化威權統治能力的情況下，社會力量仍未放棄對社會權利的追求，而以科技為基礎的數位威權治理，也並不能保證中共的執政合法性不受挑戰。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變遷動力，最終仍在於官方能否正面回應人民對於自由及法治的期待。